

序章 近代亚洲史研究的课题

一 亚洲历史全貌的再探讨

提倡对亚洲重新认识的必要性以及促进亚洲各国间交流的呼声是由来已久了。但是，尽管亚洲各国各地区有着自己固有的不同历史，而寻求既能继承过去传统，又能统一把握其不同历史特质和现状的方法，却至今尚未确立。在这样的状况下，如果对各国固有的历史、现状及其差异相当大的状况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或者相反，对两者采取简单直线连结的方式，都将妨碍我们寻求把握亚洲规模的主题契机。

在正视这种历史研究方面的问题时，理应首先指出的一点是：以某国的、民族的积淀及该国、该地区的历史与近数十年来的现状为媒介的 19 世纪中期近代史研究，尚未在整体亚洲全貌的前提下成立。换句话说，不论是否意识到，迄今为止，亚洲的近代史都是作为近代西方列强对亚洲的冲击来进行说明的，对这种分析视角在方法上的反思，应当是现在需要寻求的课题。进而亚洲各国在“开国”“开港”之后的一个半世纪，以及独立以来近半个世纪的今天，都有必要

对各国内部由西欧式“近代”所带来的影响进行再探讨，只有这样，才能对亚洲有一个新的认识。

为达到这种目的，当然首先有待于对各国、各地区认识的深化，但仅仅对各国、各地区的近代史进行阐明还远远不够。这是因为，在此，如果与历来的从外因方面去寻求亚洲近代史的契机相对，仅仅孤立地从各国的内因方面去寻求的话，亚洲史的面貌就只不过会成为内容各异的各国历史的数字上的集合，这样就脱离了把亚洲史当作一个有机相联的历史总体来把握的目的，——而解明这一课题，正是我们现在寻求的目标。也就是说，只有以亚洲整体规模来设定问题领域，并将其作为历史探讨的对象，而在其中寻求把握世界史契机的同时，通过把握对成为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区媒介体的各国历史，才能对亚洲有一个真正的认识。为此，对亚洲近代史进行再探讨成为必然的前提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19世纪以来的亚洲近代史到底应当怎样把握呢？作为研究对象的亚洲近代史理应存在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规定的方法以及内容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又可以进一步具体化为以下两方面的课题，即：

（一）构成亚洲的各个国家以及各个地区，尽管分别有其独特的历史传统，但是除了在相互之间地理上接近这个共同点外，是否还有着组成亚洲的相互共有的纽带？如果有的话，其内容又是什么？

（二）亚洲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在世界近代史上是否占有特殊的位置？而且，近代亚洲史在世界史中所起的作用的特质又是什么？

总之，亚洲史有必要从自身中寻求内在的构成要素和内在动因，为达此目的，有必要改变历来的做法，从透过亚洲观察欧洲的视角来进行考察。

在对亚洲近代史进行分析之际，我认为，与以往根据亚洲各国的近代化（工业化）过程来进行探求的方式相比较，从近代亚洲市场形成的角度来进行探讨，更容易寻求到各国所处的位置和所发挥的作用。

在此，从市场问题的领域来分析亚洲近代史的理由，是因为在这个领域中最有可能对整个亚洲近代史的面貌进行再探讨。也就是说，从 19 世纪 50 年代开始，以下的三方面内容已形成为研究的课题，即：1. 中国、日本和印度三国间围绕茶叶出口形成的竞争关系。2. 白银大量流入亚洲和与此相伴形成的亚洲银货圈，以及各国通货体制的形成和连锁反响。3. 因劳工贸易导致的国际移民劳动力市场的改变和亚洲地区华侨、印侨数量增加引起的向本国侨汇的增加——实际上这等于投资的扩大。

这些事实意味着以亚洲为规模形成的一定的自主地区市场，到了 19 世纪中叶，不仅在和世界市场的关系方面，而且在和各国国内市场的关系方面都出现了新的转变，市场关系的重组已成为一个基本事实。从而在赋予新性质的亚洲市场问题——当然这个亚洲市场，不用说已经是和中国和印度为两个轴心，以东南亚为媒介，通过朝贡贸易、互市贸易等官营贸易和通称为帆船贸易的民间贸易等形成的关系继承和发展而来——不仅在贸易以及贸易结算关系上，围绕金银流动的国际通货体制的各个方面和各国通货财政问题等领域，都受其影响，也正是在这些领域和关系中，围绕近代亚洲的

各种问题得到了体现。

以下，将在以“近代亚洲市场”为主题考察的基础上，对基本的历史事实和论点进行再分析，并希望从中初步获得对近代亚洲历史面貌进行再探讨的线索。

二 亚洲和西欧

亚洲的近代史是怎样开始，又是怎样形成的呢？关于这一点，过去理解的基本特征，可以说是以近代西欧进入亚洲来作为亚洲近代史的出发点的。也就是以英国产业资本家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在 19 世纪中叶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对封闭的亚洲及未开拓的亚洲市场冲击和打开的过程，以及与此相对的亚洲方面民族的反应和反抗的过程来把握亚洲的近代史的。基于此种视角，对鸦片战争所处的历史地位，历来的亚洲史研究又是怎样看待的呢？例如，松田智雄认为：

近代英国和亚洲的帝国清王朝在发生直接的关系后经过一段顽强的相持，终于打破了清帝国的封闭，并使之开放为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英国对亚洲各国社会贸易的扩展，同时也造成了各国资本主义形成的条件。尽管这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但它毕竟给予民族自立确立了客观的基础。不论英国本身贸易和政治的意图如何，亚洲社会却是由此觉醒了^①。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近代史面貌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

强被视为主动者或者说是近代的体现者，亚洲被视为被动者，即尚未达到近代的对象，也就是被作为欧美近代化冲击的对象来描画的。如以中国为例，则是以 1834 年英国废止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1839—1842 年鸦片战争打破广东十三行对外贸易垄断权为主要标志开始其近代的。

其次，与这种以西欧为主动者亚洲为被动者的看法相同，还有一种观点是在内容上把西欧和亚洲间的关系看成是支配—隶属关系来进行把握。例如羽仁五郎认为：

在资本主义发祥地……已把工人隶属于资本制下的运动……扩大到世界规模……人为地制造出殖民地半殖民地乃至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资本主义各国在推进自己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把殖民地乃至后进的资本主义各国变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各国的隶属国和从属国。不仅印度和中国，日本以及整个神秘的东洋，现在都不得不遵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世界史法则而无法摆脱历史的命运^②。

羽仁五郎认为亚洲已改变成西欧资本主义的农业殖民地、商品倾销市场以及投资地和工业地。关于鸦片战争的历史意义，他认为：

1842 年《南京条约》的签订，广东、上海等五个港口城市的开放以及广东十三行垄断性限制机构的撤废而开始的“自由”贸易……英国获得被割

让的香港岛、赔偿金及“平等”的交通权等等，都表明中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外交和政治上都已完全屈服于英国资产阶级^③。

认为鸦片战争的结果，使中国的近代史在隶属于西欧的情况下开始了。

这两种把握方法中，从前者看，英国是以向亚洲输出近代资本主义的面貌出现的；从后者看，英国则是以把亚洲纳入自己资本属下地位的面貌而出现的。但是在受到西方的冲击而开始亚洲的近代，以及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时期划分的标准这一点上，两者都是共同的和具有代表性的^④。

当然，在西欧和亚洲的近代外交关系上，不管平等与否，在条约关系的建立以及缔结过程中，恰恰可以说西欧是主动者，亚洲是被动者。这也就是因西欧而使得亚洲出现的“开港”^⑤。但是，不消指出西欧对于不遵守条约的不满，以及与对手国之间频频发生的各种纠纷——当然列强可以利用这些纠纷提出改订新条约的要求——虽然西欧对与亚洲各国当政者签订的这些条约，特别是其中的经济条款抱有强烈的期待，但是这些条约却无法完全包容亚洲各国、各地区的经济活动^⑥。所以，经济史研究的课题，不仅要探讨条约本身——条约关系的形成也即等于市场关系的形成；还应当探讨它们是否实行或没有实行的过程。进一步地说，还应当从条约实行过程中产生的摩擦，以及条约所包容不到的、条约规定的活动形态以及观念不同的、亚洲地区固有的经济活动的形态及其原理——西欧直接面对的所谓“亚洲的冲击”等等中去探求和确定亚洲经济的特质。“从亚洲来看西欧”，恰

恰具有这个意义。换句话说，条约中的经济条款，即使不能左右亚洲的经济，但是，从列强实现自身利益关系的角度看，也是亚洲和外界接触的外交关系的体现。因此，在研究亚洲近代经济史时，需要把亚洲历史上经济活动所具有的方式作为固有的研究对象，并以其构造为前提，从西欧经济在哪些方面与之发生接触这一视角来进行探讨。

三 中国和日本

在亚洲史研究特别是经济史研究上，对于“西方的冲击”历来是怎样把握的呢？可以说，在这里，与历来认为的、由列强带来的，即外来的契机相对应，各国都是从内因——即验证各国内在的发展方面去进行尝试的。譬如说，在认为西欧资本主义强制亚洲开放市场而成为亚洲各国资本主义形成的直接要素时，就是把中国和日本进行对比，探究为什么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国却成为半殖民地的原因和差异，从这些方面来开拓亚洲史的研究领域的。

探讨中日两国在开港性质上出现差异的原因时，从国际政治关系方面来看，认为日本的开港是在英美俄等诸列强势力均衡之时进行的，所以与中国不一样。与这种外因的分析相对^①，在探讨两者之间出现差异的原因时，则归因于中国与日本两国自身在开港前资本主义因素发展上的差异。日本方面，是以幕府末期手工工场发展状况的视角为基础进行探讨，认为当时日本国内已形成了阻止英国在日本扩张的资本主义基础。这就是“幕末严密手工工场论”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开港并不是日本开国的直接契机，开港前的日本，

国内已经处于“被打破的锁国时代”^⑧。例如，服部之总认为：

只有认为幕末开港前即已存在“严密意义上的手工工场时代”的观点，才能提示对幕末内政外交问题有一个惟一的统一合理的把握方法。即一方面这个“时代”的存在是无法扬弃的封建制经济社会基础构成的原因，而成为可能直接引发在中国已经出现的那种“半殖民地危机”的契机，但另一方面，又因为有这个“时代”作为前提存在，而成为可能克服“半殖民地危机”的契机^⑨。

这一观点主张与中国进行对照，强调日本幕末开港前存在的“严密手工工场时代”，已为此后在通向产业革命的道路上做好了内在的准备。这个问题的提出，又是将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洋务运动进行对比，围绕近代的中坚力量的性质而展开的讨论^⑩。另外，关于中国方面，基于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关心，对批发型家庭工业、手工工场生产的存在与否同样成为探索的课题^⑪。

在服部之总的理论框架内，一方面，是以西欧列强为核心，其周围配以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后进国家不是以半殖民地身份就是以殖民地的身份从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由此而构想出一幅资本主义世界图。另一方面，是根据对亚洲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发展有关问题的关心对各国进行分析。在这个框架中，亚洲各国在前者的世界构成图中处于隶属的地位，并与后者生产条件的不同发展阶梯相互交错，因这两

者间互相交错的不同位置，而相应处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等等的位罝上。

因为像这样编成的世界构想图的内容和法则是一种先验的概念化的东西，前提首先是要树立一种固有的认识世界史的阶段模式，因此在研究时的主要目标，就是寻求各国史的相应发展阶段以及对之进行对比和充实。所以，不管是在研究两国间的关系，多国间的关系，还是它们之间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的比较，进而在探究它们内在的结合原理，共存的复合领域内所关心的问题时，总之，也就是探明该地区具有的历史特质在方法上的关键点，要想从这种模式的“内部”中推导出来，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

在中国史研究方面，由于主张应把内因论放在“外压即外因论”的对立关系上，因而在此，在历来的比较史的研究方法方面都是从相应的一国的对应方面来把握，进而根据其产生诸条件的发展阶段而确定其相应的位罝。在这种方法的前提下，去探讨农村手工业的状况以及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连续性等等。在研究上，一方面注重对地主制的研究，另一方面注重对民族资本形成对象的研究，研究重点不得不在向这两极移动时形成分离。为此，以这两者为媒介的近代史研究的领域，所承担的课题必然是相当庞大和沉重的^⑫。

四 近代亚洲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从以上的叙述可知，对既往亚洲近代史研究的方法进行再探讨，应从其探讨对象即近代亚洲历史过程的具体分析中去推导并加以检讨。为何如此说呢？历史分析的理论——即

形成概念的过程，应从历史过程本身之中去把握和提炼，而决不能使之颠倒过来。历史研究是以特定问题的视角为基础，以立足于现在而对过去进行的再构成为目的。与此同时，作为其同时代史，对其时代面貌的实际状况进行把握是十分必要的。因此，为对亚洲有一个新的认识，关键是要在对过去研究方法进行再探讨的基础上，推导出亚洲近代固有的历史过程，在这个推导过程中，进一步探讨能阐明近代亚洲动态的脉络的方法。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正是我们在近代亚洲史研究上要解决的课题关键点。

（一）前近代亚洲区域市场的形成

从历史的角度对亚洲规模的宏观贸易活动进行概观时，可以看出，这是一种以中国和印度为两个轴心，以东南亚为媒介的亚洲区域市场分布图。特别是 15、16 世纪以来，随着对中国的朝贡贸易及互市贸易等官营贸易的经营发展^⑬，民间的贸易也在扩大。以华侨、印侨为中心的帆船贸易和官营贸易一起，形成了亚洲区域内的多边贸易网。在此，以中国的茶、生丝、土布，日本的贵金属、海产品，泰国的米，印度的棉花以及菲律宾的砂糖等货物为中心构成了多边的贸易网络^⑭。

19 世纪中叶以来形成的近代亚洲市场，并非是在近代西欧资本主义使亚洲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形成的，而仅仅是由于西欧加入上述亚洲市场及亚洲市场自身发生了变化，从而使得这个市场在世界市场里占有固有的位置，并作为一种历史的继承形态而得以存在。

（二）西欧加入亚洲市场——茶叶和白银

历史上形成的亚洲区域内的贸易网，通过若干条渠道与亚洲区域外的贸易道路相连接，西欧诸国正是沿着这些渠道进入亚洲的。也就是说，由西班牙、葡萄牙打头，荷兰、英国、美国诸国都为着寻求亚洲的特产而加入到亚洲区域内的贸易网中来^⑤。

纵观直到近代为止的东西方贸易历史，可以看出从亚洲市场持续而典型的流向欧洲市场的商品是茶和生丝，而流回亚洲市场的最典型的货币则是白银^⑥。但是，西欧等国的重金主义者对白银的流出持批评态度，并寻求一种不用银结算而能获得茶叶的贸易方式。首先，他们尝试用本国的工业产品作为等价物而未获成功。之后，则试图利用多角贸易关系的形成和多角结算方法来达到目的。即英印中的三角贸易关系中以印度鸦片为媒介形成，并通过英美中的三角贸易关系把中国卷入国际市场。在此所采用的结算方式是，美国商人在广东向伦敦汇出的票据，被英国商人购入后充当自己向本国的汇款。因此，可以说这个多角贸易关系的历史性质，是以棉布生产和原棉供给这样的英美间的关系为基础，以两国都共同需要茶叶而形成的，为确保茶叶供给为目的的多角贸易关系（参见第四章）。

但是，构成英印中三角贸易关系重要一环的鸦片贸易，其实质却是一种走私贸易，在中国沿海进行的鸦片交易必须采用白银支付的手段才能进行，为此原因导致了中国白银需求量的增加，并导致了白银价格的上升。由于鸦片贸易的这种性质，使得多角贸易关系不断加深和影响中国的白银市

场，并促进了白银向中国的投机性流入。事实上美国的白银也在一直不断的流入中国市场^⑩。

如此，在观察亚洲和西欧主要通过茶叶和白银进行的对应的贸易历史过程时，可以说鸦片战争是处于这两者关系的延长点上，并因西欧力图在多角贸易中把鸦片贸易合法化和扩大茶叶采购市场的企图而引起的。

看来，“自由贸易”这一主张并非是英国近代产业资本家阶层独自垄断的名词，同时也是地方贸易商人为实现自身利益时使用的时髦口号。

（三）近代亚洲市场

茶叶的出口竞争。

近代亚洲市场的形成过程，并不应从英国棉布对亚洲的渗透过程上来把握^⑪，而必须从作为历史上形成的亚洲市场进入近代世界市场的角度来进行阐明。如从贸易关系方面来看，进入 19 世纪 50 年代后茶叶的出口构成方面显示出的变化就说明了这一点。这就是日本茶、印度茶出现在历史舞台。

当时驻日领事阿礼国（R. Alcock）就此对日本的市场状况有如下叙述：

开港之后最初的一年间，在通商方面实际达到的成效，可以说是日本作为中国产品的竞争对手，尤其是在质量和价格上能够提供有利于我国（指英国）的茶叶和生丝这一点，已被清楚地确认了。……相当优质的生丝的一部分，与中国最上等

的产品相比，能以更高的价格卖出，1 磅达到了 4 先令^⑬。

在历来是由中国垄断的茶叶和生丝的市场方面显示出了日本潜在的竞争性。实际上，到 20 世纪初叶为止，日本已经取代中国而基本上垄断了美国的绿茶市场^⑭。

即使是在殖民地的印度，茶树的栽培也在试行之中，由于阿萨姆红茶的试制成功，1839 年孟加拉茶叶公司、阿萨姆茶叶公司先后设立，经过 40 年代末有利可图的经营，广泛的茶园相继建立，到 80 年代末，面向英国出口的印度红茶已凌驾于中国茶之上^⑮。

随着日本茶、印度茶的上市，中国茶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亚洲开始了茶叶出口的竞争。其结果，茶叶再也不是受地理条件限制的特产品了，茶叶在成为直接连接伦敦和纽约市场的国际商品时，两地的市场状况，反过来又对亚洲三国出口的茶叶具有了选择和左右的力量。旧有的茶叶出口三角贸易关系被改变，在向西欧市场出口茶叶方面形成了三国竞争的新的亚洲市场。这样一来，历来被垄断的特产贸易关系出现了根本的变化，世界市场的价格变动影响和规定着茶叶的出口状况，由世界市场变动状况决定亚洲茶叶出口市场的格局遂告形成。

白银流入和银本位。

先于近代亚洲市场之前即已存在的银货流通圈，进入 19 世纪中叶以后，由于通货体制与西欧及金银比价相接轨，从而出现了银本位圈的金融特征。

进入 19 世纪 50 年代以来，出现了白银再次向亚洲大量

流入的现象。西欧解释这种现象的原因如下： a. 向亚洲出口白银本身即可能获得利益，并能抵消进口茶叶和生丝的费用。 b. 因大量进口茶叶和生丝而不得不出口白银以进行支付^②。但从汇兑结算以及贸易收支导致白银流动的角度进行分析，这个时期有特色的见解还有， c. 采用金银复本位制的西欧国家中，白银的使用量减少，并逐步将白银换为黄金。 d. 亚洲各国习惯大量使用白银，特别是作为通货来使用^③。在此，作为通货发挥作用的白银，是在新的东西方通货体制关联的基础上被展望的。

以业已实行金本位制的英国为首，法国、德国、荷兰等金银复本位制的国家， 19 世纪 50 年代以后在白银产量增加、银价下落的背景条件下，为应付黄金的流出，已被迫减少白银的流通量，从而将剩余的白银出口到亚洲。这种白银的流入，不仅充当了贸易结算的手段，而且意味着亚洲白银圈发挥了调节西欧银价（等于通货体制）变动的白银市场的机能作用。与此同时，这些白银对于英属印度、海峡殖民地、香港等等殖民地的通货体制的整备，日本开港后的黄金投机^④，种植园和其他投资上面也都发挥着作用。

16、17 世纪以来，随着西班牙银元的流入，对于已经是白银流通圈的亚洲，不管是在各国国内通货，还是税制、财政等方面，白银为中心的地位都得到了加强。到了 19 世纪 40、50 年代后，随着金银矿的相继开发，在西欧向金本位制逐渐过渡的同时，亚洲的银本位圈作为通货体制也逐渐被纳入到国际金银比价体系内部之中。如此，在近代亚洲市场上，历史上即具有基础的、与西欧的金本位制相表里的银本位圈不仅逐渐形成，而且是以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一部分的

白银市场的面貌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

苦力贸易和向本国汇款。

亚洲市场进入近代的第三个特征，是 19 世纪中叶开始出现了真正的苦力贸易。

苦力，显然是指 19 世纪 30 年代开始的中国和印度的契约劳工，但却是特指这些跟历史上被出口到海外去的奴隶一样被卖去从事强制劳动的移民劳工。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出现，最初是为开发英国的海峡殖民地，向槟城和新加坡输送。1845 年左右开始从厦门、香港、澳门等地直接向南北美洲、澳大利亚等国“出口”，而于 19 世纪 50—70 年代达到高峰。其背景，是以英国 1833 年的奴隶解放令为发端，此后法国、秘鲁、美国、荷兰、西班牙等国也相继出现解放奴隶的动向。但是，奴隶解放的结果是殖民地产业出现了严重劳动力不足的局面，印度和中国人劳工，正是作为填补这个空白的取代物而出现的。特别是 1846 年英国颁布“砂糖法”后，不管是外国出产还是殖民地出产的砂糖均需课以相同税率，这使得以毛里求斯为首的西印度的殖民地，迫切需要廉价的劳动力，亚洲的劳工贸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兴起的。另外，北美、澳大利亚矿山的开发，也需要数量众多的劳工输出^②。

如此一来，在国际劳动力市场中，以印度和中国人劳工为中心的亚洲劳动力被投入到殖民地经营、矿山经营等事业中去。为确保劳动力的供给，以殖民地经营主——亚洲代理行——当地中介人为联环组织起来的劳工贸易机构建立起来，形成了西欧资本下的亚洲劳动力市场。

但是，这种劳动力的出口只不过显示出了事态的一个方

面，可以说，与移民大军相伴而产生的向本国汇款的网络才是值得注意的对象。即这些劳工和向东南亚的移民，是向中介者和雇佣者借钱出国的，出外挣钱的动机又很强烈，因而当他们出外后，为偿还所借的债款和接济国内的家属，都要向国内汇款。当然也有这种情况，就是作为添置财产的手段而向国内汇款以购买土地。这种向本国的汇款，特别是到东南亚的移民在向本国汇款时，华侨主要是通过银信局、银信汇兑局等机构，印侨主要是通过切迪阿（Chittir 印度的一个社会阶层，在这里从事金融业的较多）等在当地的小汇兑业者进行。如前所述，流入亚洲的白银在增加，而这种向亚洲的汇款实际上也形成了金融网[®]。但是，这种汇款并不一定和西欧的经济活动相交叉。通过这种汇兑网络流入的资金，单独进入贸易金融、投资和地产市场，并在这些领域流通和运转。

像这样形成的亚洲金融市场，以新的伴随着劳动力流动的资金流动为契机，和作为历史继承形态的亚洲区域内的经济关系一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金融方面再一次得到了协调和统一。

综上所述，形成亚洲近代市场的标志，到19世纪50年代为止可以概括为：a. 中日印三国间在茶叶出口上的竞争。b. 亚洲白银本位圈的形成。c. 劳工贸易和向本国汇兑网的形成。以上的这些状况意味着，在研究近代亚洲市场时，不能仅仅着眼于进出口贸易，还必须对金融市场进而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分析。与此同时，还必须注意与这些内容相通和紧密联系的、近代世界市场上的动因对作为历史继承形态的亚洲市场发展的影响。而且，还必须了解，进入19世纪中叶

后，在亚洲区域内，当一国的历史被作为近代史提上历史日程时，其前提，却是近代亚洲——具体的说是近代的亚洲市场——已经得以形成。

五 传统经济和现代化问题

当我们在探讨近代亚洲市场及其范围时，有必要一方面确认其内部地缘上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阐明其各地区、各国内部的经济活动的内在历史特质。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中国时，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特别是理解其经济侧面所具有的历史含义的线索时，就很有必要从其传统的经济社会中举出几个有代表性的特征，进而考察其对现代化问题给予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及两者间的相互关系。

因为，从历史的角度对传统经济进行考察，是确定现在正在进行中的现代化位置和方向的根据之一。而且，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还可以找到思考日本经济社会的现在和过去的线索，以及在传统和近代的关系中，中日之间的对比线索等等^④。

（一）亚洲的近代化

从历史上看，亚洲各国的近代化过程虽然存在程度上的差别，但都是以西方社会的近代化作为模式来进行的。换句话说，也就是其要达成的目标，一般来说都可以从外部进行设定。同时，近代化的内容，是以经济发展为主体，其中，又是以实现生产率的上升而形成的社会秩序为主要目的。因此，近代化实际就是工业化的同义词，为达成工业化，对于